

哪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会如此专业

邓海建

一周倏忽而过，“双汇肋排烫出蛆虫”事件仍一地鸡毛。6月3日下午，双汇集团副总经理刘金涛称：“双汇肋排烫出蛆虫”事件是一场阴谋，索赔者从买走产品到到店索赔不过1小时许，还全程录像，“哪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会如此专业？”刘金涛称，双汇集团将依法反击。（《大河报》6月4日）

恶意构陷还是善意监督，其实对购买双汇肋排的消费者来说，这有什么重要的呢？真正要紧的是：这有图有真相的肋排上，到底附着些什么玩意儿。这些看起来未必友好的“附加物”，断然不是商家

的“买一赠一”。在瘦肉精事件、菌落总数超标事件之后，始作俑者还能不能关得上质量管控的大门？

爆料者说是“肉生蛆”，当事企业说是一场阴谋，真相就在这众说纷纭与谣言四起的舆论中沉浮跌宕。有一些细节，至今令人耿耿于怀：一者，5月31日，即双汇蛆虫事件传播开的第五天，有媒体报道称，郑州市工商局金水分局工作人员对涉事双汇连锁店进行调查。金水分局工作人员两次在肉品中发现“黑色不明物体”，第一次被店内一名男子解释为木耳，第二次被该男子抢走——此般行径，让人联想起最初赔偿上的争执，这多少有些“心虚”的嫌疑吧？二者，根据索赔者提供的视频，拍

摄者认为两名员工的行为是在转移问题肉品，但刘金涛解释说“这是应客户要求，用摩托车去送货”——即便双汇所言属实，在这个配送过程中，冷冻肉没有完整的包装、没有规范的冷链物流已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冷冻肉如此“不冷冻”地流转，即便不生蛆，质量安全果真无虞？

一家大型食品企业，关涉千万消费者的食品安全，没人希望双汇糗事不断。但不管持怎样的主观意见，既然出现了疑似“双汇肋排烫出蛆虫”事件，而且衍生出诸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情节，真相也惟有不打折的真相才能让人心安。双汇的“阴谋论”或者也有道理，但证据却令人发笑——索赔者从买走产品到到店索赔不过

1小时许，还全程录像，“哪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会如此专业？”这话问得很对。普通消费者遇到问题商品，大多是哑巴吃黄连，遇上抢先一步的商家，别说蟑螂、蚂蚁，就是“神马”怪兽，你都死活留不下证据。但在这自媒体年代，全程摄像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

再说，知假买假也不犯法，反倒是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实施以来，以王海为代表的购假索赔之风在争议后归于共识，只要符合公共利益与道德原则，依法索赔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益，别说1小时，就是买了之后当即索赔，都是法律平台上公开博弈的事情，就算消费者专业一点，哪里能论证出什么必然的阴谋？

倒是当事企业这一嗓子让公众反思多多：“哪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会如此专业？”是啊，也正是因为我们不专业，既无法专业取证，也不擅长专业维权，猫鼠与潜规则才有了生存空间，而一次次质量丑闻竟然左右不了一个品牌的命运。市场吊诡如斯，质量倒逼还有什么法力可言？

不怕消费者不专业，就怕监管者不尽责。一周过去，“双汇肋排烫出蛆虫”事件仍疑点重重，这对消费者、当事企业，乃至市场秩序都是一种无情的戕害。清白还是不堪、事实还是杜撰，公理不能作壁上观。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从今以后，咱真得做一个“专业”的消费者。

冰点时评

“董而不独” 独董制度不要也罢

邓聿文

供职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邹恒甫最近微博炮轰独立董事（简称“独董”）以爱国之名发财，称“这些学者在国内混不过是为了敛财，他们当然是富人官商腐败贿赂的走狗代言人”。邹建议废除独董制度，因为独董现在只是花瓶，不能独立，甚至成为利益输送的途径。话虽刻薄，却不无道理。

邹发难是因为近期21世纪网连续做了几期相关报道：在我国A股2314家上市公司中，共设有7595个独立董事职位，独董总人数达5593人，平均每位独立董事在1.36家公司任职——“一鱼两吃，一鱼多吃”现象相当风行，身兼四五个独董职位的不在少数。“最牛独董”、人大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徐经长竟兼着六家上市公司独董（《南方都市报》5月26日），其独董年薪共33万元。如果履职到位，他如何分身有术？这虽属极端个案，但折射出独董不过是上市公司的一个摆设而已。

一些独董是公司老板的哥们、师长或社会名人，大多不具备担任独董的应有知识结构，公司要他们，一乃制度规定，不得不要人来装点门面；二是利用其人际关系网络，为公司或老板自身谋取利益。不少独董一年难得出席一两次公司会议，就能轻松获取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独董收入（薪酬多寡主要取决于其社会价值及知名度），何乐而不为？自然，这就背离了独董“独立于大股东及其代表”的应有之义，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。

独董制度本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免受大股东侵害，可我国引进该制度10多年来，它基本上没有发挥“独立”的作用，甚至沦为大股东的“帮凶”。这当然有人情、法律文化及独董自身素质的问题，但根子在于独董的产生方式与制度本身的冲突。按证监会规定，上市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、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%以上的股东可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。然而，现实中独董的提名多由大股东掌控。大股东当然不会找一个和自己“过不去”的人做独董，这也是多数独董是大股东哥们或师友的原因。即便不是亲朋好友，找个名人或领导做独董，也不大可能指望他们去为中小投资者说话——独董都是从公司领取薪酬，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发生利益冲突时，他们能保持中立就不不错了。

独董制度之所以在中国“化橘为枳”，根源是中外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同。独董本以英美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为前提，即使如此，目前在英美国家，独董也有被大股东绑架的危险。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，大股东往往控制着董事会。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会一元制，我国则是董事会、监事会二元制。再加上对独董监管不严，我们几乎没有对独董违规行为处罚。

一些学者为此提出强化问责的解决办法，或者为独董制定严格的前置条件，如独董聘任和批准过程透明化、一人只能担任一家公司的独董、其所有公开言行避免“利益冲突”、就任前公布个人财产等。但强化问责要以履职为前提，履职不到位，何来问责？其他条件在当前社会环境下，也难有实现的可能。在公司治理结构处于二元制下，控制权与监督权有效分开，监事会能对董事会进行监督与制约，设立独立董事已无必要。依我之见，独董制度不要也罢。

郭震海

官员“作秀”是百姓极痛恨的，譬如官员骑自行车，总免不了遭百姓质疑。然而，近日一位副市长骑自行车，不但没有引起质疑，反而引得一片叫好；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骑自行车不是下乡，而是送自己的女儿上学，相关照片在网上“疯传”（《新安晚报》6月2日）。詹云超承认，自己几乎每天都骑车送女儿上学。其爱人也表示，平时都是“老公负责送，我负责接”。

詹云超再正常不过地送女儿上学，此举能引起“围观”，显然是因为其“副市长”身份，还因为他骑的是自行车，而非耀武扬威开着公车。这次网上一边倒叫



公车

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为1430辆公务用车张贴“公务用车”统一标识，这些贴标的车辆将实行节假日（含双休日）定点停放，严禁公车私用、私驾。（人民网6月4日）

漫画：徐简

谁来给我们的孩子看病？

梁剑芳

近期，广州几家医院以该院靠近儿童医院为由，请求上级取消本院的儿科。若非国家规定三甲医院一定要开设儿科，许多医院巴不得扔掉儿科这个“烫手山芋”。（《羊城晚报》6月1日）

春夏之交是儿童发病的高峰，很多医院的儿科包括儿童医院都人满为患，急诊候诊四五个小时已司空见惯。一方面，儿童就医苦于排队；另一方面，不少综合医院却有意取消儿科。

“不管你是发烧、拉肚子、咳嗽或者手足口病，都要等6-9小时！如果你能等待就挂号，不能等，请去其他医院”——这是5月19日，深圳市儿童医院挂号处工作人员在窗口张贴的手写告示，被网友曝光并遭口诛笔伐后，医院负责人道歉，当事人也被扣发三个月绩效工资。不过，也有不少人认为该工作人员说了实话，只是语气过于直白；即使语气改得再亲切，儿童看病难的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！

儿科爆棚，说明儿科数量不够；急诊都要排长队，说明儿科医生不够。有需求就应该有供给，应大力发展儿科才对，为

何大型综合医院反而竞相逃避？

儿科是麻烦最多、“效益”最差的科室之一。儿童对外界理化因素敏感，许多检查如CT、X光等，原则上能不做就不做，能少做就少做。儿童的用药量通常比成人少一半，很多药品如针剂需拆开用。儿童小病多、大病少，单次就诊的花销小。在很多综合医院，儿科的收入可谓无足轻重。

另一方面，儿科是最累、最苦寒的科室之一。从早晨8时开始看病，一直到下午6时下班，往往一口水都顾不上喝，饿得不行，中午趁病人进出门的间隙匆忙喝一口牛奶——这是一位小儿呼吸科医生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。据广州妇儿医疗中心门诊部主任介绍，该院今年门诊量可能突破350万人次，每天每个门诊医生要看70至80个病人；流感时，有大夫一天看了130名病人！由于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无法准确地用语言表达，很多症状都要靠医生观察和发现，这就特别费时费力。为了避免差错，医护人员要对药物和治疗措施反复核对，疲惫不堪。由于科室“效益”不高，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也就高不起来。

在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的当下，儿科医护人员挨打的现象更不时出现，尤其是护士，经常因为静脉穿刺时未能一步到位而被家长报以老拳。儿童病情变化发展快却难以自我表达，加之容易对药物过敏、出现不良身体反应，用药再谨慎都可能出事，这些导致儿科是医疗纠纷的高发区。“收入低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，没有尊严，没有社会地位……”是很多儿科医生的苦衷，于是，医学生中盛传“当什么都不当儿科医生”！去年广州妇儿医疗中心招聘40多个儿内科医生，应聘者中有20个符合要求，可最终前来报到的才13个。

数年前，有调查显示，“90%的医护人员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医”。今年2月，厦门大学宣布从9月开始，该校所有新招的医学生免收学费，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优秀的医学生源！

当前儿科面临的困境，只是医院未来困境的缩影——医学院校的招生困境已经显现，医学生甚至医生改行当医药代表早就不新鲜，连不少护士都开始苦学英语以出国就业……如果不能有效改善医护人员的执业环境，那在不久的将来，谁来为我们看病？

请阳新县公开教补“空饷”去向

胡印斌

本该惠及每一名农村学生的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，却招致湖北省阳新县受义务教育学生人数频频“闹鬼”。在当地官方统计信息中，“蹦”出几千名在学校难寻踪迹的学生领此补助，这已不是个案，甚至一些本不存在的“幽灵学校”，仍在领着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6月4日）

实际在校人数仅为2147人，而到了政府网站统计数据那里，骤然成了5266人，为什么会多出3000多名学生？阳新县有关人士认为这源于学生随外打工的父母异地就读、转入县城公立私立学校、提前上中职以及辍学等。

那么，那些被冒领的教补到底流向了何方？

按照阳新县有关人士的说明，“因为人员流动造成的多余额项，教育部门会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建设”。这是一句空话，所谓“多余额项”，原本是不该发生的款项，属于地方虚报人头，冒支冒领，是一种严重违规的行为，根本谈不上如何妥善使用的问题。更何况，连底数尚且搞不清楚，“多余额项”当然就是一笔烂账，又如何能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建设？

当务之急应该是，尽快查明当地历年来实际在校的农村学生人数，并核对所领取的当年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，搞清楚具体的差额数目。接下来的，就是敦促阳新县公开这些被冒领了的资金到底是如何使用的。

按照规定，各校均有学生档案，教育部门也有年度报表，这些情况想必也并不难核查。

“高居庙堂”怎能真知民生

“肃静”和“回避”。过去政府官员身居衙门，偶尔出访、视察也须地方小吏清道，这才封建社会产物。如今，一些地方官员出行，也大搞警车开道、警员清道，前呼后拥，整个车队更是无视红绿灯，一路畅通无阻。譬如，上级官员下基层原本是去听民声，然而浩浩荡荡，事先有基层官员安排好，甚至进哪一户都提前嘱咐好，还有模拟和预演的。如此下基层，怎能听到真正的民声呢？

官员出行需要保护，这在国内外都

有，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需要动用警车、警力，中央曾有明确规定，真正按这个规矩办事的又有多少呢？百姓常说：“官不大架子不小”。确有一些官员特别喜欢讲究“级别”，公文包有人提，车门有人开，喝茶有人倒，乘电梯有人跟，就差有人代理吃饭和上厕所了。别说一个副市长，就是一个副县长，真正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又有几个？动辄就是“忙”或“应酬多”，又有几个官员真正到菜市场买菜？吃饭有人陪，家是常不归。看报道，但凡

提到官员，总是说该同志一心为公，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爱人和孩子，难道这些官员就真的那么忙吗？君不见，倒下的贪官中，十之八九在外面养着“情人”，有的甚至不止一个，这又反映出什么吧？

一个真正爱民的好官，首先要从爱家开始，一个真正亲民的好官，首先要从亲近自己的家人开始，每一个官员都应该扪心自问：每月在家里陪着爱人和孩子吃过几顿饭？在外面风光光地进饭店和酒楼，

和刘翔一起享受伦敦奥运会

刘道彩

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，刘翔以12秒87夺冠。赛后接受采访时，刘翔说：“来尤金参赛没带着输赢之心，纯粹为了享受比赛。我是抱着平常心参加比赛的，这个成绩是小惊喜。”（《工人日报》6月4日）

今年室外赛三连冠、本赛季保持“不败金身”，这一连串成绩足以证明刘翔已彻底摆脱脚伤阴影，七步上栏正逐渐调整到最佳状态。

12秒87的好成绩，再一次点燃国人对这位奥运冠军的无限期待。世界纪录加夺冠的佳绩，已浮现在很多人脑海中了；有媒体打出标题——“奥运刘翔在他人只能争银，伦敦不登顶岂不是逆天”；新浪网一项调查也显示，四成以上网民期待刘翔再次打破世界纪录。

刘翔奥运年强势回归，固然可喜可贺，但笔者还是不想看到“翔飞人”再次被捧上九霄，承受四年前那种高期待、高压力的，也不愿看到一些人“爱”刘翔，“爱”的只是金牌与成绩。

目前，刘翔的几个主要对手的实力都很强，而且今年都保持了较高的竞技水平，特别是古巴名将罗伯斯一直雪藏实力，在高原进行针对性训练；更大的难题是随着刘翔年龄的增长，高强度比赛和训练后的恢复时间慢了，现在距离伦敦奥运会还有近两个月，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不可否认，刘翔几乎被认为是中国

田径队冲击奥运会金牌的“独苗”。在“体育政治”与“金牌体育”的背景下，目前的刘翔不仅代表一个项目，一个团队，甚至成了中国田径的代名词。据报道，这些年田管中心每年花在刘翔一个人身上的钱，能赶上上竞走等项目全队好几年的投入，即使他有伤病也未减少过。从2009年复出那一刻起，刘翔的目标似乎就非常明确——夺取伦敦奥运会金牌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运动员在冲金失败后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“我尽力了”，很少有人说享受比赛过程的快乐，似乎快乐不属于赛场，或只属于获得金牌的人。但经历过事业过山车般起伏的刘翔，对体育本质的理解更高人一筹。在去年世锦赛与罗伯斯的“拉手”事件之后，面对公众义愤，他笑称“这就是一场游戏”；今年的室外比赛中连续跑出好成绩，在被美联社、法新社等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时，他也多次坦言，自己是带着一颗平常心参加比赛、享受比赛。

没错，体育说到底只是一种游戏。在110米栏这个项目上，刘翔已不缺什么荣誉，即使登顶伦敦奥运会，他也不过是“故地重游”。平静面对金牌，既不会由此否认运动员付出的努力与成绩，也不会影响到中国体育的地位、风采与荣耀，更无损于中国向世界展示的自信与实力。体育的终极目的是让人更健康更快乐，在伦敦奥运会上，我们不妨和刘翔等运动员一起享受比赛。

别误读官员“作秀”

杨于泽

新近有观点认为，官员“作秀”有“不可避免”性，进而提倡官员学会“作秀”。文章说，要面对群众，要和群众打交道，形象展示就不可避免，“秀”在某种程度上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。此一“新见”很快就受到舆论广泛关注。

泛泛地把“秀”说成“官员的必修课”，其实不仅缺乏逻辑严谨性，也不符合“国际惯例”。“官员”的概念，从最狭义的层面理解，也相当于“公务员”之说，即过去所谓“党政机关干部”。根据国家公务员局今年3月公开的数据，截至2010年，我国公务员总数约为689.4万人。如此众多的官员都去“作秀”，公共管理岂不是沦为一个硕大无比的秀场？

“秀”当然是介绍决策、亮明态度、表达情感的方式，“秀”得好，有利于改善和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。这话没错，其实“秀”的主体资格已隐然其中，即官员中的“决策”者，而非一般官员。国外也是一样，有权作秀的，往往是某些搞政治的人，包括各级政府首长、政客、民意代表、政党领袖等。他们“作秀”的目的，是在与选民互动中推销自己，实际上是一种“政治广告”。

但从世界范围看，假使我们把“官员”理解为政府公务员，则大部分国家的公务员分为“政务官”与“事务官”两大类，“政务官”指选举产生和政治任命的官员，“事务官”则是选举产生和政治任命之外的官员；“政务官”负责决策，而“事务官”负责贯彻执行，也就是埋头做事。在选举中，“事务官”严守中立原则，没

有“秀”的资格，也没有“秀”的必要。

在各国政府公务员中，“事务官”都占到政府公务员总数的绝大多数，这也意味着，绝大多数官员不具备“秀”的资格，也没有“秀”的必要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能做什么、该做什么，是被法律程序界定了的，总的来说就是贯彻执行决策者的决策，为民众服务。“作秀”先天地被避免了，自然不成其为绝大多数官员的所谓“必修课”。

把“作秀”误当成官员的必修课，这反映出我国公务员制度中分工不清晰的问题，有继续完善的必要。各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，是为民众提供专业化的公共服务，这就意味着公务员必须实行专业化分工，达到提高服务效率的目的。而基本的公务员分工法就是，决策与执行分开，负责决策的官员负责决策并对民众“公关”，而一般公务员负责贯彻执行。大多数官员，应以服务的专业化、高效率赢得民众认同，而非以“作秀”博得公众好感。

从道德上说，所有官员都应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，了解民众的愿望和需求，“作秀”自然就是“到群众中去”的一个途径。但一个专业化服务人员好过一个多面手，民众欢迎那些踏踏实实提供公共服务的官员，而不会真心喜欢那些把公共服务表演化的官员。

事实上，“作秀”体现政治的价值理想，而一般官员的公共服务必须强调“依法行政”。一般官员的职责当然不是宣扬价值观，他们能够严格按照“政务官”负责决策，而“事务官”负责贯彻执行，也就是埋头做事。在选举中，“事务官”严守中立原则，没

又有几次是自掏腰包？公车不得私用，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？小“腐”不拒，离大“贪”还远吗？

其实，詹云超副市长作为父亲骑自行车送自己的女儿，这本是分内事；作为官员，他公务之外骑自行车而不用公车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之所以受到公众“围观”，说明现在不少官员热衷于前呼后拥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。

公众赞扬詹云超骑着自行车送女儿，这其实是呼唤各级官员能真正放下“架子”，别“摆谱”，既然来自群众就该融入群众，融入生活，与群众打成一片。如果官员总是“高居庙堂”，下基层把小麦认作韭菜，那时丢掉的就不仅是民心了。